

[德国] 施台凡·舒曼 著
李士勋 译

最后的避难地

上海

索卡尔和杨珍珠
的爱情故事





最后的避难地

上海

——索卡尔和杨珍珠 的爱情故事

[德国] 施台凡·舒曼 著
李士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8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8—5958

Letzte Zuflucht Shanghai
by Stefan Schomann

© 2008 by Wilhelm Heyne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uenchen,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Culture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避难地:上海:索卡尔和杨珍珠的爱情故事
/(德)舒曼著;李士勋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99-8

I. ①最… II. ①舒…②李… III. ①纪实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4132号

责任编辑:全保民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开本680×1000毫米1/16 印张13.75 插页24

2010年8月北京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8199-8 定价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序.....	1
I 旧世界	5
索卡尔颜料商店	7
御赐宝剑	17
学好德语	27
光华——光耀中华	33
凤凰保险公司	42
外国人的城市	50
五月三十五日	59
II 遥远的城市	69
“现在你们只剩下是犹太人了”	71
西班牙风格的楼房	85
啊，你这个可怕的城市	95
在寺庙里避难	113
另一种瘫痪	120
III 新时代	133
隔离区的黎明	135
杨村	147
Bon ami	152
一位悲观女人的信	162

在 Love Lane 里弄散步	167
贵重的珍珠，光辉的荣誉	180
上海最后的日子	185
“小孩儿回来了！”	193
跋	201
译后记	216

序

宁波人遇到某种特别稀奇、珍贵或罕见的东西，就称之为“一条大黄鱼”。这里所说的大黄鱼是指那种令人渴望的、相当于黄花鱼家族中比较贵重的黄鱼。普通的鱼虽然也偶尔会进入渔民的网中，但是一条真正的大黄鱼还是很少落网的。

杨珍珠，宁波一个望族的千金和来自维也纳的犹太青年罗伯特·劳伊文·索卡尔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条大黄鱼。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特殊事件，一个独一无二的浪漫故事。这个故事绝非偶然地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那个奇闻异事到处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而且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一切例外都会变成常规的城市：上海。三十年代，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足足一万八千名犹太流亡者在那儿找到了避难的终点站。那地方不是他们挑选的；如果说他们还可以选择的话，那么这简直就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一种惨无人道的暴力正在世界的另一端肆虐，那是一个暴徒横行的城市、罪恶的渊藪，带着屠杀氛围和令人无法理解的文化烙印。那也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但在所谓合并的奥地利和“十一月大屠杀”之后，几乎所有可以考虑的国家都缩到官僚主义壁垒后面躲了起来，于是就只有遥远的长江三角洲的海港城市成了最后的一条出路。太多迥然不同的势力在那里冒险，都试图支配一切，因此那里没有一个要求签证的中央权力机构。那是一种历史的心血来

潮：假如巴拿马或者吉布提保证自由入境，流亡者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到那儿登陆。到那时为止，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去中国。即便他们在那儿逗留了差不多十年之后，他们的联系也只限于最急需的几种。在最好的情况下交流也会发生误解。只有很少人能成功地克服融入中国的真正障碍——语言。许多人甚至连一次中国饭也没有吃过，他们只和同乡交往。更不用说他们会爱上一个中国人了。在那一万八千人当中，大概只有十来个人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在上海的西方人几乎不会有一个长期独居，可是这样的结合对于那些一无所有、惊慌失措、非情所愿处于临时状态的流亡者们来说，似乎简直就是大错而特错的行为。逃亡途中的爱情关系和一个从夜总会跑出来的舞女可能发生的一夜情也许没有什么不同。至于那种严肃的结合，无论和一个亚洲女人还是和一个亚洲男人结婚，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罗伯特·索卡尔却敢做敢为。这位朝气蓬勃、求知欲旺盛的生物学大学生在大学里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子。一段试探性的、出乎意料之外的离奇浪漫史开始了。双方的家庭都很不高兴，婉转地说，也只是一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杨珍珠的父母亲担心自己的女儿落入一个“乞丐”和“野蛮人”之手；对于罗伯特的父母亲来说，他与一个“亚洲女人”的结合则好像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丑闻。然而，他们俩却顽强地坚守着两人之间安静、骄傲而又大胆的爱情，尽管在他们周围也许没有人能够理解。单从表面看，他们的关系似乎也不是那种干柴烈火式的爱情故事，原因也许在于亚洲人的习惯、年轻人的胆怯和这两位未来的自然科学家的羞涩天性。然而，环境却使他们的爱情成为一场冒险，尽管那时候世界到处充满暴力，时代变幻莫测，他们还是风雨同舟，厮守一生。当年他们俩相

识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以至于使他们整个一生都受益匪浅。这就是他们的，同时也是两个家庭、两种文化和两个大陆之间的故事。

中欧的流亡者们感到在上海失去了根基。但是，罗伯特在书本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学习、知识、研究——在他身上，这些东西的作用就是使他生存了下来。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学生，现在他的杰出能力在中国脱颖而出。世界四分五裂了，而他只要取得优秀的成绩，最烦恼的事情也化作烟云消散。科学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当然，1943年的上海看起来并不是科学研究者飞黄腾达的合适跳板。那里的大学和西方世界完全隔绝，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中国其他地方隔离。尽管如此，罗伯特·索卡尔最后还是发展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他成了打开新科学领域行业的一位稀有的代表——可能这恰恰是因为他被迫开始独立思考的缘故。因此，他的故事就可以被当作一种向自修者典范致敬或当做特别好学者的个案研究来阅读了。

当时，上海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热点文化和全球商业潮流的枢纽。正是在那个疯狂的、愤怒的三十年代，它显示出自己是那样一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城市：一个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人口大杂烩，一个肮脏的世界奇迹。冠冕堂皇的、不正经的、老奸巨猾的、吃人的、放荡的和没有感情的人，应有尽有。那里的摩天大楼比欧洲的还高，那里的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那里的赛马场、交响乐团或者那里的豪华宾馆不用担心和拘泥于细节的西方人做比较。但在这同一座城市里，也生活着一百万中国难民，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倒毙街头，在所有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死于哺乳期。上海精神（the Shanghai mind）——这个闪闪发光的概念标志着那种善

与恶的锋利意识。公正与不公正、真实与谎言，诸如此类通行的道德货币在这里是无效的。可是，在这种形形色色的放荡之中，无辜者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在斗争中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上海，这个违背人们意愿的世界城市，显得像一个多棱镜那样，当我们眼看着就要感到习惯的时候，它却冲破了时代的冲突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它像一个剧院的包厢位置那样处于太平洋战争舞台的中心。然而，大概我们直到今天方才意识到当时在东亚所完成的那个时代转折的规模。

相反，像许多别的坚固而令人感到舒适的东西一样，三十年代的维也纳，从前的多瑙河王朝光荣的资本，却像一个延续了数百年并得到巩固的文化城市那样处于欧洲的心脏。然而，这个世界却正在走向毁灭。我们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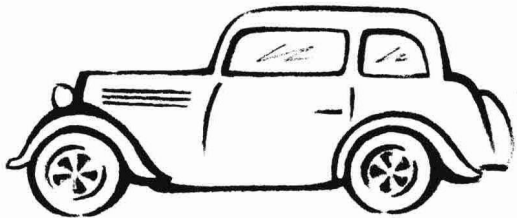
I

旧世界

阅读乃一切快乐之最。只读史籍，会使我们愤怒多于娱乐。每当我们读到一个好人被枪杀或一个政府落入太监或独裁者之手时，我们就几乎要发疯。但在我们感觉到这种绝望的同时，也会感觉到一种美学的影响。^①

——林语堂

(中国作家，1895—1976)



^① 这段引文并非林语堂的汉语原文，而是作者根据林语堂的《生活的重要性》与《论图书和阅读》等英文著作中的文字改写而成。——译注



索卡尔颜料商店

除了我家里没别人。门铃响了——我屏住呼吸，透过猫眼向外面张望。德国党卫军冲锋队的人常来检查共同租住的房客。可是，我看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乞丐，所以我就没开门，又轻轻地溜回房间。这时候，门铃再次响起来，我又一次向外窥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那个人形体有点异样。突然，我明白了，那是我父亲。他光着头，没戴眼镜，牙齿被打掉了，他已经变成无人照管的伤残者，裹在他身上的那件破大衣长及脚踝。谁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夏天他就被抓走了。当然，现在我立刻让他进来了；但那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几乎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仍然看得见我从猫眼向外窥视时的那幅景象。

索卡尔是索科尔一个稀有的变化。这两种发音涉及的是同一种动物：鹰隼。在绝大多数斯拉夫语言中，都是这样叫的。也有一个与索卡尔同名的小城市，这个小城位于雷姆贝格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们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那个地方迁移到雷姆贝格的。大多数索卡尔家族都是犹太人。

我的父亲西格弗里德·索卡尔 1892 年生于雷姆贝格，排行老二：路德维希、西格弗里德、柯内尔和蕾拉，也就是奥蕾拉的呢称。大多数犹太人家庭的祖先当中都会有一位犹太教经

师，就像每一个俄国流亡者至少有一个叔叔是大公爵那样。但我们家族只出了一个颜料商人。我父亲的父亲，甚至爷爷的父亲就已经干这个行当了，就像后来他的弟弟柯内尔一样，尽管他对这一行并不那么得心应手。我父亲十四岁时在他祖母的暗中支持下离家出走，祖母把两个古尔登金币偷偷塞在他的长筒袜里。他在维也纳的一家颜料厂找到一个位置并在那里完成了学徒考试。

1910年他应征入伍，加入K+K军。正当他的服役期满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因此，他在军队里一待就是七年，最后他在连队里当会计。他服役的地方是意大利前线并在那儿经历了伊松佐河战役。尽管他不一定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却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他甚至热爱皇帝，就像几乎所有的奥地利犹太人那样。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选择了社会民主党。当他复员回到维也纳的时候，他获得了满师证书，终于在第十区宠臣街开了一家店铺：安东广场索卡尔颜料店。

我母亲克拉拉·拉滕纳生于1893年。她在寇洛美雅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加利奇的亚布隆诺夫长大，她的父亲以西多是希尔施男爵学校校长。这位犹太男爵把他的财富归功于几条铁路的建设，其中有一条是东方快车。他创办的这所学校应该把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犹太人居住区的居民培养成同化的市民。因此，意第绪语在那儿是被禁止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当地的语言。虽然以西多本来读为伊萨克，当然那是意第绪语的发音，不仅因为它要适应当地环境，而且也是为了与孩子们的家长沟通，在自己家里说意第绪语也被禁止。所以，在我们家里从来都不说意第绪语。后来，当我在上海更多地钻研意第绪语的时候，我的母亲感到很不高兴。对她来说，这种语言很粗俗。我所掌握的一点点意第绪语的知识却偏偏是在中国学

会的。

以西多和他的妻子冉内特也有四个孩子：玛雅、弗丽达、克拉拉和沙洛。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生的，每个人都得到父亲的一笔另外的资助。因为在多瑙君主立宪的国家里有好几个这样的希尔施男爵学校，以西多每过几年就被调动一次，直到俄国入侵加利奇于1917年把他们一家驱赶到维也纳为止。出于对俄国人的恐惧，他们几乎徒步走了整整几千公里。起初，他们还隐藏在亚布隆诺夫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的树林里，然而，当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那个小城市变成一片火海之后，他们知道再也没有退路了。

官员在这个家庭里被视为男人的理想。他为大女儿玛雅挑选了一个铁路官员做新郎，一个奥伊尔贝格的工程师，后来在三十年代他成了寇洛美雅火车站的站长。为二女儿弗丽达找了一个未来的法学家劳尼欧·拉格施坦因。只有我的母亲出了圈儿。大概有好几个候选人，甚至和其中一个订了婚，但是却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婚。当她在位共同的女友介绍下与我父亲相识并于1922年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一位商人！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然而，后来她在姊妹四个当中情况却是最好的，至少正常的婚姻关系存在了那么久。

在维也纳的头几年，她是凤凰保险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她的亲戚中有好几个在那儿供职，她的姐夫劳尼欧也在那儿。后来他甚至把我父亲也带去签订了一份人身保险。他本来叫萨姆埃尔，希伯来语叫施姆埃尔，意第绪语叫施密尔，后来却使用波兰语的爱称形式尾音尼欧，被称之为施密尼欧。劳尼欧就是从这个名字演变来的。此外，在我们家里几乎从来没有人这样叫他，只是在纸上那样写：我的表姐菲

利西娅使用的名字是菲拉，曼雅的名字是阿玛丽亚，而叔叔沙洛本来叫亚历山大。

结婚之后，我母亲过的是一种很讲究的维也纳太太的生活。从童年起，她的头发就是金黄色的，后来借助于过氧化氢染色。每当别人把她和一个电影明星相比的时候，她听了总是很高兴。她经常去咖啡馆、戏院、轻歌剧院和大众歌剧院。有一次当她的名字登入报纸的社会专栏，虽然被排在最后，但她相信自己已经成功了：

猎兔球戏是最美丽的女人和姑娘们约会时玩的游戏，大厅用常青藤装饰一新，构成一幅令人陶醉的图像。包厢全部被上流社会人士坐满。可以看到联邦总理夫人穿着一身白色的绸缎，巴伐利亚公主艾尔维拉梳妆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身珠光宝气。瑞士特使夫人穿的是飘逸的丝绸，相反她的小女儿则像一位真正的阿尔高地区女子。商务顾问夫人、柯克埃斯夫人、索尔特里阿德斯的夫人和克拉拉·索卡尔夫人，则穿着华丽的蓝色民族服装。

我是1926年1月13日出生的，是头一个，也是独子。在我们的圈子里，一个孩子是惯例。那些年我们还住在商店附近。这期间父亲已建起一个生产颜料的车间：说工厂有点夸大其词。不久，那个商店变为三个：一个在安东广场，一个在附近的英岑多夫大街，第三个在多瑙河运河与施拉赫特霍夫之间的第三区艾尔德贝格大街。每一个商店里都有一个帮工和一个学徒，索卡尔的商店一共有十多个职工。像主店一样，分店也位于工人区，因为油漆粉刷工人大都住在那里。此外，工人之家粉刷房屋都是自己动手，与此同时，市民圈子的人们都委托

手工工人为他们粉刷房屋。索卡尔家生产的颜料质量很好，所以我的父亲有很多老主顾。他在工作中获得了很大快乐，更不用说从中还会获得经济收入了。

在当时，那样一个商店也是半个卫生用品商店。出售毛刷、扫帚和板刷，也可以买到化妆品、香水和香皂。刷墙的颜料、油漆和染色剂排列有序，供应充足。工作的时候，我父亲总是把一件白大褂套在西服外面。母亲经常把她的犹太人女友送到商店里去，但他回家之后总是抱怨和她们没有做成什么生意。他只雇用过一次犹太人的学徒，然而他和那个学徒很快就发生了问题。我父亲肯定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他对这种人的观点有一定的保留。他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刷子：如果我们需要油漆粉刷，他就委托自己的客户或者一个帮工去做。

我父亲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丰满，圆圆的脸庞，戴一副眼镜。年轻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抹发蜡，这种东西他的商店里也卖，他的头发向后梳。有些照片显示出他的脸庞似乎像一个亚洲人。他父亲的一张肖像也可以看出一些塔塔尔族（鞑靼）人的气质。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索卡尔家族的谱牒里有过一位欧亚混血儿。

母亲比父亲矮一点儿。她叫父亲弗里茨，他叫她克拉拉或者克莱尔辛（小克拉拉）。他们叫我贝尔蒂。我在一张有栏杆的紫铜床上睡觉，一直睡到八岁。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祖母，校长夫人冉内特经常坐在这个金笼子旁边对我背诵席勒和歌德的诗。有《钟之歌》，《波利克拉提斯的指环》和《魔术师学徒》。她说话带有一点儿轻微的奥地利口音。一位语言学家也许可能会从她的女儿克拉拉的发音中听出另一种卷舌音：估计孩子们的母语是波兰语。我父母亲谈话有时候也会用波兰

语，虽然我父亲很不喜欢这样。只有当他们不想让我听懂的时候，他们才使用这种语言——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只会几百个单词。我父亲的德语说和写都比我母亲更流利，此外他的德语准确而且没有拼写错误。

由于难民的涌入，维也纳的犹太人当时增加到二十多万：在二十年代，这个数字又有所下降。粗略地估计一下，大约十个维也纳人中有一个就是犹太人。我的父母亲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逃亡到维也纳来的。我祖父名字叫鲁宾·索卡尔；为了纪念他，我的名字叫罗伯特，也就是相应的德语发音。后来，我又接受了希伯来语的变音劳伊文作为第二个名字。我祖母的名字碰巧和我后来的妻子同名，叫朱丽叶·索卡尔。当我对祖母和外祖母都还有强烈记忆的时候，我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坚持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市区去。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住进维登区宠臣街的南站旅馆改建的楼房里。我第一次看见那座房屋时的印象几乎是一个花花世界：灯火通明，有电梯、门房、地毯，一进门的大厅里有栽种着棕榈树的大木桶。我们搬进一个很宽敞的阁楼里。当我习惯于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时候，善良的朋友和亲戚们都在餐厅里用餐。与我们关系亲近的少数客人被请进男士的房间。今天，沙龙的概念几乎是一个没有用处的空间。描金的巴洛克式家具都被盖住，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揭开。天花板上挂着水晶枝形吊灯，墙壁上有带花饰的长臂壁灯。旁边有三个小房间：分别是父母亲、我和保姆的卧室。此外还有一间浴室，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摆放古董的穿堂和一条长长的走廊，有时候我在走廊里踢足球。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母亲那样，我母亲也梦想着我会成为医生。然后，